# 《解放日报》如何宣传“调查研究”

□ 林　宁

1941年8月1日，党中央下发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总结党成立20年来调查研究的基本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9月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这个决定。自此之后半年间，《解放日报》紧扣决定精神，大力宣传调查研究，助推全党调查研究工作走深走实。

（一）

只有让各级干部深刻领悟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才能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担当。1941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刊发《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阐释。文章指出，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清楚计算敌友我各方面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及其力量的对比，作为党正确决定政策的基础，有效组织革命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定的政治立场，客观的态度，善与人处，虚心向下，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调查研究工作本身应有的起码条件，而这些是和狭隘的宗派主义、空想的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所以调查研究工作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文章创造性地拓展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当前的调查研究还是使党主动应付时局实际行动的根据，指出如果不能掌握国内外政治生活的动脉，不能及时探悉时局变化的动向，就要迷失方向，在任何突然事变前手足忙乱，不知所措，为敌所乘。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

在列宁逝世18周年之际，1942年1月2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强调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现；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因此，加强调查研究，决不仅是一部分研究机关的责任，而是全党的责任，每个干部的责任。社论贯穿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了对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彰显了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实践厚度，对全党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形势任务、担当调查研究责任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二）

各级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解放日报》刊发了多篇谈调查研究经验和体会的文章供广大干部交流学习，其中不乏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好做法。

《材料真实性与研究材料——农村调查谈》就怎样取得真实而完备的材料提出了“1+9”的管用办法，“1”为首先必须要做宣传解释，“9”为视情况选择性采用的包括重复与本人谈话或把几个问题重问一下、与同院居住的邻家谈话、从农民的互相矛盾中去发现材料、知识的准备等9种办法。最后劝告调研者，无论检查或研究调查得来的材料，如果开始时不管，等到堆集多了，那时再来一份一份地补缺和研究，头痛，麻烦，不但容易马虎，吃力不讨好，而且简直就是很不容易挽救的遗憾。

《实地调查经验谈》是一篇介绍调查研究全过程经验做法的高水平文章，把调查研究分成调查员的条件、怎样选择地区、知识的准备、提纲与调查表、宣传解释、从何着手、怎样访问、证实材料与解决群众困难、检查研究整理9个环节，环环相扣，确保真正取得实效。作者牛山曾是中华青联考察团调查员，总结经验有理有据，有实例分析，恳切坦诚，廓清了调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认识，提供解决困惑的常用办法。如对有人不要调查提纲的主张，明确指出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提纲是目的的具体化，也是检查材料的尺度；没有它，如同骑上无羁的马，很难掌握全部情节。对许多干部关心调查研究从何着手的困惑，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在总的方面，先社会经济状况而后工作情形，先农村而后城市；而社会经济或工作的下手处是个别调查。更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应先从家庭（或商店）调查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切实的材料。

（三）

党中央作出调查研究决定不久，毛泽东布置给西北局一个紧急的调查研究任务，写一份运盐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将任务交给了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的延属10县工委秘书高克林。他当晚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回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干部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让他们详谈了第一次运盐的经过。通过算账，一般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00元以上。这一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等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高克林连夜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经过、沿途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7个问题共计2700多个字的调查报告，第二天就派人将报告送往延安。

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亲自拟定题目《鲁忠才长征记》，推荐《解放日报》发表并加了署名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后来，高克林回忆：这个调查报告不仅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成为当时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四）

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列出了31个问题，要求各地回答所列问题加以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点、经验作出总结，报告中央。

为了助力各地检查总结半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三四月间《解放日报》围绕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集中推出了一批执行程度较高的地方工作报道，其中有两篇报道被安排在头版刊发。一篇是《晋西区党委设立各级调查研究机构》，主要回答了“建立了何种调查研究机关”等问题。报道指出晋西区党委仔细研究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认为晋西北党内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还严重地存在着。同时指出区党委已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除专任干部外，还请晋西北一级在职高级干部50多人兼任调查研究员；各地委设调查研究科，县设调查研究员，由地委、县委书记直接管理。

另一篇是《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整顿三风》，主要回答了“是否进行典型研究”“怎样在同志中进行中央决定教育”等问题。报道指出1941年10月，北方局即派出了两个调查团，在3个月中间，以两个县的四五个村庄为典型，调查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社会情况与党的支部工作。为了帮助同志们的学习，晋东南的新华书店翻印了中央决定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极受各地欢迎。

# 蒋筑英：甘做追光路上“铺路石”

□ 柳　琴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蒋筑英，甘做追光路上的“铺路石”，辛勤探索、忘我工作，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摘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52页

蒋筑英1938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一个旧职员家庭，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1962年考取著名光学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后一直在该所从事光学传递函数研究工作。1982年6月，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在成都逝世，终年44岁。他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

**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蒋筑英从小努力学习，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依靠助学金完成学业。他常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正是因为怀着这种感恩之心，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异常刻苦，准备将来报答党的栽培，10个寒暑假有8个在图书馆度过，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还掌握了英、俄、德、日、法5门外语。

大学毕业时，蒋筑英放弃回到离亲人更近、条件更好的杭州或上海工作，毅然选择了去祖国光学事业的重要基地、离家千里之外的东北，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所长的研究生，做到一个领域追求一生，一项事业奋斗终身。

蒋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家庭出身影响了他的入党，但他始终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入党道路受到了阻碍，但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在研究所，他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虽无一官半职不管事，却对群众疾苦啥都管，是同事心中的“不管部长”。科研之余，他认真学习革命领袖的著作和中央文件，坚决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他生前一遍遍地写着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去世前不久所里已批准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虽然他生前不是党员，但他以实际行动坚守了信仰，书写了忠诚，奉献了青春。正如人们在给他的挽联上所写的——“坚持马列，光明磊落，忘我工作，对祖国无限忠诚；刻苦钻研，才华横溢，不计名利，为四化鞠躬尽瘁。”

**建立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然而这个科研领域在中国当时还是个空白。“国家需要，是我们的责任”，这是蒋筑英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的心声。

光学传递函数理论于1946年提出，在1962年的国际光学第6次会议上得到世界公认。1964年，当日本东京国际光学第7次会议上刚刚出现第一批光学传递函数的专题报告时，年仅26岁的蒋筑英也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光学传递函数论文。

蒋筑英深知，理论突破只是一个基础，研制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才具有真正的实际价值。为此他白天进行实验和设计，晚上查阅国内外文献。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1965年，年仅27岁的蒋筑英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高水平建立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为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条件。而这一成绩的取得只比发达国家晚一年多。

此后，蒋筑英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制了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在光学传递函数标准化、系列化方面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色度学、光学检测等领域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编写的《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以及设计的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他撰写的《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蒋筑英如“永动机”一般，总是废寝忘食地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把对祖国、对党深深的爱，都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急国家建设之所急，在追光的领域勇登科学高峰。

**用热血谱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奉献之歌。**光，耀眼璀璨、普照大地，而蒋筑英这个追光的人却甘当“铺路石”，甘于平凡。蒋筑英常说，“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

蒋筑英心里只有责任，从无个人利益。他克己为人、大公无私，研究所里评职称、分房子、提工资时，蒋筑英主动让给更需要的人；周末劳动时，他主动挑脏活累活干；他父亲的问题平反时，他写信让父亲不要向国家伸手。他淡泊名利、从不藏私，翻译了大量论文却从不占为己有，发现别人研究课题的有用资料主动翻译赠送，帮助同事修改的论文发表了却不让署他的名字，与人共同研究取得科研成果了却让一起合作的同志出席学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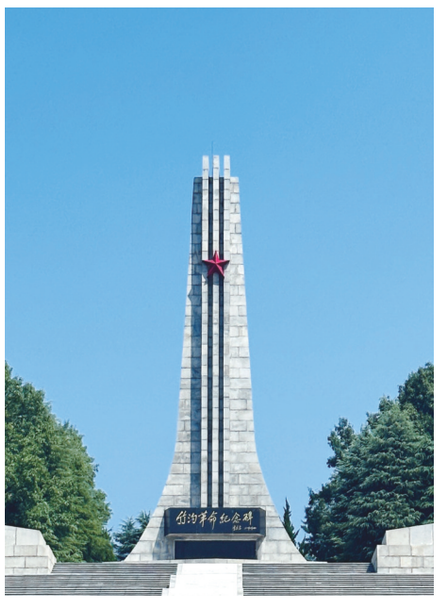
即使身在国外，他也心系祖国。所里派他到德国进修，他从国内带去一大包四川榨菜当作家常菜，通过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积攒了相当于几年工资收入的钱，全部给研究室添置了打字机、录音机和一些紧缺的光学部件，并买回若干台电子计算器分给同事们，帮助大家提高工作效率。

蒋筑英时刻想着国家、想着事业、想着他人，却很少想着自己、想着家人。蒋筑英家住长春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由于长期劳累，他的病越拖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厉害，爱人着急催他赶紧去医院看看，他却总是说“等明天吧”。直到蒋筑英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最后4天里，他还不知疲倦地每天忙到深夜，忙着收拾新建的实验室、帮助同事修理下水道、打扫卫生清理垃圾。1982年6月15日，蒋筑英带病去成都验收一套大型检测装置时，因积劳成疾致使病情恶化，最终生命定格在了44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蒋筑英的事迹给予充分肯定，聂荣臻亲书“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

# 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就是小延安

## ——竹沟革命纪念碑碑文敬读

□ 余　昕




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坐落于河南省确山县，始建于1958年，占地188亩，由张爱萍题写园名。1986年动工修建竹沟革命纪念碑，1987年4月落成，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写碑名。纪念碑高22.8米，造型新颖，雄伟挺拔，象征着革命先烈的高大身躯，激励着中原儿女奋发崛起，再铸辉煌。纪念碑底座正面刻有《竹沟革命纪念碑》，全文如下：

**确山竹沟是我党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一九二六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张星江、王国华等同志为首的鄂豫边省委创建了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一九三八年二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彭雪枫同志来竹沟主持工作。三月，第八团队开赴抗日前线，设留守处在竹沟继续坚持斗争。六月，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到这里，并相继建立竹沟地委和县委。省委负责同志朱理治，陈少敏等先后来此工作，使竹沟成为河南人民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

**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领导。刘少奇、李先念等同志从延安先后来到竹沟。中原局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很快打开了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使竹沟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

**竹沟又是中原地区的革命摇篮。我党在这里通过举办党训班和教导队等形式，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其它骨干力量。新四军二师一部、四师和五师的基干部队，都是从这里出发，汇合各地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竹沟的重大革命作用，使国民党反动派极端仇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反动势力以重兵袭击竹沟，我军民奋起反击，终因敌众我寡，被迫撤离。敌人惨杀我军民二百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确山惨案”。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和全国抗日军民表示极大的义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张云逸、彭雪枫等同志纷纷发表演讲和通电，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此后，竹沟地区的军民在我党领导下继续顽强地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青山巍巍，绿水汤汤。在竹沟战斗过的许多革命前辈、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犹如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鼓舞和激励我们为着光辉的未来而前进。**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

碑文回顾了竹沟从最初建立的基层组织到成为一块重要根据地的光荣斗争历程，肯定了竹沟作为中原地区革命摇篮的重要作用，表达了对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事业、慷慨捐躯的英雄先烈的深切缅怀，读来心潮澎湃，令人动容。

（一）

大革命时期，中共河南党组织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立中共驻马店特支，归豫区委直接领导。1927年4月，由上海大学返乡学生张家铎任书记，与部分党团员共同领导发起农民运动，首次解放了确山县城，建立了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随后，中共竹沟党小组负责人李畔林、赵子乐等率领竹沟、石滚河一带3000多民众参加了暴动，并建立了竹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从此播下革命的火种。

1933年7月15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对确山北区的13个村进行“围剿”，掠夺财物，滥杀无辜，制造灾祸。1934年春，全省党组织遭敌人极大破坏，确山县几乎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党支部，大批革命骨干或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害。1936年1月，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岁月后，鄂豫边区省委决定重建并发展党的组织，创建红军游击队，开辟以竹沟为中心的鄂豫边区根据地，为继续革命奠定基础。

（二）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2月，彭雪枫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并到竹沟主持工作。彭雪枫首先对集合后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进行了思想上、军事上的全面整训。此间，收编了安可祥、段永祥两股具有革命倾向的地方武装。至此，第八团兵力迅速壮大到1300多人，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中阵容较强的战斗队。1938年3月，在信阳邢集誓师后，第八团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在江淮之间掀起了抗日斗争的高潮。第八团东征后，为妥善安排伤病员、家属，处理交通联络等事宜，经国民党当局批准，在竹沟设立了留守处，开办军政教导大队培训党政干部。1938年5月中旬，徐州失守，中共河南省委由开封迁驻竹沟，很快使竹沟成为河南抗战的领导中心。

（三）

1938年11月，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央决定在竹沟设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指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刘少奇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大力发展武装，重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很快使竹沟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被誉为“小延安”。

由于竹沟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激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纠集确山、信阳、泌阳三县的重兵突袭竹沟，杀害抗日军民2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竹沟惨案”（又称“确山惨案”）。此后，竹沟地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至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革命时期，刘少奇、李先念、王震、王首道、王恩茂、方毅、张劲夫、张爱萍、张震、徐海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过，无数革命英烈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